



## 论文选《凝意斋集》自序

时间: 2004-9-7 10:18:14 来源: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作者: 王曾瑜 阅读867次

目前时兴广告热,不少学界人士颇为热衷于给自己做广告。我有一次对好友王春瑜先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说:“我的广告是八个字:先天不足,后天失调。”这表明本人尚有自知之明。与优秀的前辈学者,例如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、邓广铭先生,长辈漆侠先生等相比,我心悦诚服地承认,自己在学问上有难以企及的差距。我喜欢与中年、青年学者当平等的朋友,欢迎他们直率的批评和争论。因为我相信,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,日后的成就是会在我之上,甚至会超迈自己可望而不可及的前辈优秀学者。但是,有时我对某些似乎是领时代风骚的学术界宠儿和骄子,却显得高傲。问题还不全在学问,而主要是我瞧不起他们的为人,人品必定影响学问。

在惨痛的十年浩劫期间,我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悲观到接近崩溃的地步,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,是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教训,才使我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事实上成为我重新学习中华古史的课堂。原来中华古史与今史之间,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今史中各种纷繁复杂、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,其实不难在古史中追本穷源。我终于领悟了古今一揆的哲理。我被迫在痛苦中反省中国史学的道路,中国史学家的学术生涯。

前辈郭沫若先生当然是一位大才子,他才气横溢,绝顶聪明,一些别人下了成年累月死功夫的学术问题,他稍下功夫,即能点铁成金,超越他人。他是史学界中唯一兼写文学作品者。我们这一代人,几乎无例外地受他文学和史学作品的影响和熏陶。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《十批判书》中对法家极端专制主义的批判,真精彩,真犀利,真深刻,堪称是千古不朽的史笔。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面前,他确是个当之无愧的民主斗士。

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郭沫若又拥有与前迥异的双重身份。一方面是学术文化殿堂里的第一尊神,受到人们顶礼膜拜,有时香火颇旺,却全无灵验。另一方面又是权势的帮闲,外界因素是权势,内在因素是媚骨,压抑,甚至吞没了他的才华。他的作品活像一个风标,经常被政治龙卷风刮得团团转,不辨东南西北。不少作品只能成为贻羞千古的笑柄。他丧失了文人学者应有的独立人格,简直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思想,只是简单地充当权势的录像带或传声筒。虽然已经竭尽了奴颜婢膝之能事,却是照样被权势侮弄于股掌之中。我曾见过他的一个儿子,虽然没有说话,但是他颖悟、英锐,在他身上似乎见到了其父年轻时的身影。可惜后来在文革时被活活整死。尽管《十批判书》挨了政治批判,又有丧子之痛,郭沫若却还是不改旧辙。过去勇敢批判法家极端专制主义的似乎不是他,而是另一个郭沫若。1976年初,他发表了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诗篇。曾几何时,又填词“欢呼华主席”,说“四人帮”“迫害红太阳”。以至最后编《郭沫若全集》时,此类不合时宜的文字就被痛加删削。其实,白纸黑字,铁案如山,被删削后的所谓“全集”,既然不能完整地、真实地反映郭沫若的学术生涯,因而也不具备人们常说的科学性。

不要以为我快意于对郭沫若先生的批评,我真是为这位前辈的大才子,为他悲剧性的学术生涯,深感惋惜和悲哀。当我入大学之初,正逢所谓又红又专的辩论,郭沫若当然被奉为学术界又红又专,值得青年人歆羡和效法的圭臬。然而痛苦的现实却迫使我逐渐清醒,决不能重蹈郭沫若先生后半生的旧辙,因为我是人,是中国学者,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,在官迷面前,我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人。我逐渐痛心地觉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奴性,因而

也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事和论著加以洗刷。我逐渐意识到，写文章的第一要义，就是摆正自己作为社会主人一员的地位，必须以社会主人的身份和资格说话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。王春瑜先生喜欢陆游一句诗：“位卑未敢忘忧国。”但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应与陆游完全不同的时代，按照马克思主义，我们就应是“位高未敢忘忧国”。高就高在社会主人的地位，不需要，也不应当低三下四。媚骨必然扼制史才。

学术的发展当然需要有正当的、公平的竞争。但既然存在着人们常说的官本位，学者的地位和价格，就必然与权势发生关系，任何人也不得逃脱。学术竞争也就会蜕变为与权势亲疏厚薄的竞争。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，实惠与名节也往往难以两全。在外界看似神圣的学术文化殿堂里，很多人却在做浑水摸鱼的勾当，也是势所必然。

在与权势亲疏厚薄的竞争中，我当然不是成功者。但使我感触很深的，还是最近因为乔迁之喜，得以接触一些行业的外地民工。文革前和文革中，我曾去过农村，多少知道一点位于社会底层者的生活。这次我重新了解一点民工，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，还是在中国大地上再现。日月虽明，不照覆盆之下，广大民工甚至享受不到诸如劳动法、工会法的阳光，他们就是生活在覆盆之下。他们一般工作十多小时，而不知八小时工作为何物。有的人因为无力长期坚持此类劳作，只能重返乡村。一些民工的日常“营养”只有大米、白菜、萝卜和盐。他们不高的工资，还不时受到“企业家”的无理克扣，而不知工会为何物。更有甚者，当然是诸如广西一个“优秀乡镇企业家”属下活活淹死的矿工，而威胁死难者的家属不得告状，一个未成年的少女，因长期超强度、超时间的劳作，而倒在作坊。当我向王春瑜先生讲述自己接触外地民工的见闻时，他不免感叹说：“我们还是生活在社会上层。”是的，我们无法与花天酒地的大款和贪官相比，也无法与学术界似乎是领风骚的宠儿和骄子相比，但与外地民工相比，我们在待遇上还能有什么抱怨？

我所写的一首七律的后四句，可以代表自己进入暮年后的心境：

乌髻白发浮生短，齐简晋笔傲气存。剩有老蚕丝未尽，孤灯青史送黄昏。

中国悠久的史学当然有其光荣传统。有人端出所谓“盛世”修史，宰相监修国史之类，作为要今日学者继承的古代史学的光荣，实为混珠之鱼目，其要价却是二亿五千万的民脂民膏。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歌颂的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”，才是中华古代史学传统的一颗骊珠。好生恶死，趋利避害，求福免祸，乃是人之常情。然而他们为了追求直书，而不惜承受杀生之祸，足以体现中华古史学的崇高。

我深知自己学识的浅薄，深知个人力量的微弱，个人一点作品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，连一滴水的地位还不够格。有位朋友曾说：“你写的文章能起什么作用。”我的回答是“不计成败利钝”。这句话是脱胎于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，但我不敢以“鞠躬尽瘁”自命。既然有了前引顾炎武的教训，自己就应当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，尽一点匹夫之责，人到老年，就不必有成败利钝的顾忌。不抓紧时间，讲一些真话，发一点心声，又更待何时。让别人走他们的阳关道，我走自己的独木桥。

编入本自选集的有三部分文章。一是历史论文，占主体地位，二是小杂文，三是关于我撰写历史小说的一点体会。

关于个人的一些治史情况和体会，在开头《我和辽宋金史研究》一文中已有交待，在此不必重复。《王安石变法简论》代表了研究这次变法的一种见解。我写过不少经济史方面的文章，但因文字颇长，在此只选两篇较短者。其中《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》是一篇书评，却并非就书论书，别具一格，如今学长漆侠先生竟成故人，也以对其《宋代经济史》的书评，而深致怀念之意。《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》是长篇考证文字，代表了贯通辽宋金史的研究。《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》是军事史论文。其他文章则属于对中国古代专制传统的批判和反省，涉及历史哲学，其中《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》一文还涉及对宋高宗、秦桧降金乞和政策的学术争论。《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》一文，则是用杂文的笔调，讽刺宋高宗和秦桧亲自发动和导演的自我文化造神运动，剖析专制统治者那种自欺欺人，寻求自我麻醉的变态心理。用好友张泽咸先生的评价，与我众多的论文风格颇异。

在文革期间极端苦闷时，我曾大致通读鲁迅先生的杂文，而深深敬服其杂文的精妙和深刻。但自己万万没有想到，近年来，居然在王春瑜先生的引领下，也开始写一些杂文。搜入本集的五篇短文，都曾经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。使我惊叹的，是自己花费成年累月功夫写就的史学专著，其社会效应竟不如花一天半日写就的一篇杂文。

历史小说是我新近涉足的领域。本集所搜的三篇，谈了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己见和写作的体会。

- [上一条: 崔文印先生与我的一些交往](#) (9-7)
- [下一条: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己见](#) (9-7)

相关专题: [王曾瑜专辑](#)

相关信息: [《凝意斋集》](#)

- [中国古代的丝麻棉 \(续二\)](#) (9-15)
- [中国古代的丝麻棉 \(续\)](#) (9-15)
- [中国古代的丝麻棉 \(一\)](#) (9-15)
- [宋史研究要点](#) (9-15)

尚无信息

[>>更多](#)

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 错误 '80040e21'

ODBC 驱动程序不支持所需的属性。

/gbookshow.asp, 行 43